

深度把脉“跨世纪文学”的律动与可能

——评刘起林著《胜景与歧途：跨世纪文学的多维审视》

赵卫东

(浙江科技学院 人文与国际教育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23)

[摘要]《胜景与歧途》一书作为对跨世纪文学“多维审视”的“断代史著”,基本立论与整体框架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和深厚的现实基础,根本命题生发出如“知青作家的‘失乐园’心态”“历史文学创作的‘盛世情结’”等重要学术问题,个案研究实现了对许多高难度研究课题的突破,还形成了文本分析和超文本考察整合研究的学术范式,从而有效达成了对“跨世纪文学”律动与可能的深度把脉。

[关键词]《胜景与歧途:跨世纪文学的多维审视》;“跨世纪文学”;历史意识;学术发现;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4)06-0152-03

Profoundly Grasping the Rhythm and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Trans – century Literature”

——Review on Liu Qilin's Book *Creation Boom and Wrong Path: Multidimensional Review on Trans – century Literature*

ZHAO Weidong

(School of Humanity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23 China)

Abstract: *Creation Boom and Wrong Path* is an academic monograph of dynastic history about reviewing trans – century literature in a multidimensional way. Its general argument and overall framework embody a strong sense of history and profound realistic foundation. The book discusses some important academic problems, such as “paradise lost” psychology of educated youth writers and prosperous situation of historical literature creation. It realizes several breakthroughs in many difficult research topics in case study. Moreover, new academic paradigm has been adopted in the book by combining text analysis with hypertext reviews together, and thus effectively grasps the rhythm and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trans – century literature profoundly.

Key words: *Creation Boom and Wrong Path: Multidimensional Review on Trans – century Literature*; trans – century literature, sense of history, academic foundation, academic paradigm

“当代文学能否入史”早已不是问题。因为冠以“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五十年”“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等的文学史著,据说已成百上千。以其中某一时段做更加细致的“断代史”研究的成果,也已不乏诸如“十七年”“文革”“新时期”“八十年代文学”甚至“九十年代”文学研究的专著

了。可以说,当代文学的研究正呈现“即时的批评”与“即时的文学史研究”同步发展的景观。而在当代文学的“断代史”研究中,比较规范和流行的大多是选择其中某一特定现象,以“专题”的方式展开。刘起林的当代文学“断代史”研究专著《胜景与歧途:跨世纪文学的多维审视》则不尽然。作者以

收稿日期: 2014-07-15

作者简介: 赵卫东(1970-),男,河南汝南人,浙江科技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当代文学。

“1990-2010”这段尤在转身之际、更加迫近现实的整整20年的文学“入史”,试图全面探询这段既有“跨时代”意义,又具“跨世纪”特点的文学之多重面相与审美特征。这是一个既要有学术“弄潮儿”的雄心,又要是敢于险中求胜的高手才能完成的学术选题。统观全书可见,作者冷静的理性已经穿透了还带着体温的文学现场,既为“胜景”热情“点赞”,也对“歧途”满怀忧心。作为对中国文学跨世纪状态展开“多维审视”之“前无古人”的“断代史著”,无论书中的分析与论断将如何被正在不断延展的文学发展所证明,我都相信,《胜景与歧途》将成为后人研究这一文学时期难以绕开的一页。总的看来,本书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首先,《胜景与歧途》的基本立论与整体框架,体现出强烈的历史意识和深厚的现实基础。

在现有的当代文学史研究专著(包括教材)中,最“潮”的也只会将“史”的下限止于1990年代。将时间更切近的、刚从眼皮底下经过的现实“入史”,难矣哉!刘起林却将跨世纪前后的20年作为一个独立的、有着特殊历史意义的文学单元,从不断流逝的历史之河中截下,作为自己解剖的对象。这种将眼前还在发生的文学“历史化”的做法,我们在现代文学产生不久的1920年代已经看见过。当年,新文学史最早的写作者胡适、朱自清等人迫不及待地将亲身参与、尚在展开的新文学“入史”,因为他们认定自己开创的事业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壮举,所以敢于“自我作古”。那么,刘起林是如何对“跨世纪文学”进行整体立论的呢?他认为:“‘跨世纪文学’这一文学史阶段划分的理论构想,基本思路是根据20世纪最后十年和新世纪前十年的中国文学确实存在紧密内在联系和历史逻辑统一性的客观事实,突破学术界已有研究中各种既成的研究框架和学术概括,从文学发展与时代文化整体格局关系的角度,以整个社会文化由‘革命文化’向‘建设文化’转型的客观实际为历史和理论基础,来对这一时期文学的多元探索和追求‘文学盛世’的努力,进行一种审美研究和文化考察相结合的学术阐释与价值评判。”^[12]

将跨世纪文学中多元文学探索和“文学盛世”追求,作为其自成文学史段落的内在理据,无疑具有充分的现实基础。当代文学60年确实从没有像

90年代那样“多元”过、像新世纪那样追求“盛世”过。既然这除旧布新的20年确实产生了某些特有的审美元素与文化精神,放在新文学发展的长时段观照,明显地初具某种独立的文学形态,那么,其意义即使不能与五四新文学的“划时代”意义相比,但不也同样具有值得研究的学术价值吗?由此看来,《胜景与歧途》的基本立论和整体框架确实是能够成立的。

其次,《胜景与歧途》牢牢把握住“跨世纪”文学、“跨世纪”作家这个根本命题,由此生发出了有关跨世纪文学的若干颇具意义的重要学术问题,体现出作者对于重大创作现象的独特理论发现。

既然是“跨世纪”,作者学术考察的重心,就应该是在其前后10年中有所贯通、前后相继的那些文学元素。果然,作者一上来就扭住了“知情作家”与“历史文学”这两个最具跨世纪意义的文学现象,作为切入论题的起点。

作者认为:“中国文学的‘跨世纪’时期,知青一代作家无疑属于文坛的中坚力量”。事实确实如此。知青作家起步和成名于80年代,成熟于90年代,在新世纪前10年又以各自厚重大气作品证明其不可替代性。对于知青作家,本书既归纳了他们的某些共有的特点,也以个案研究的方式分析了梁晓声、王安忆、张承志、韩少功等的创作和精神个性。在探讨知情作家精神姿态与心理底蕴的共性方面,作者重点揭示了他们由青春时代生命体验所导致的“失乐园”心态,指出他们无论选择何种侧面敞开和强化他们的人生经验,无论以何种精神立场和话语形态呈现其生命本色,亦不论其品味青春时代的生命历程还是面对新的时代语境发言,都无法摆脱这种宿命般的“失乐园”心态。这种对知青作家群体心理原型的抉发,尽管难说最早、但无疑是论证最详实而见解最深刻的。

历史文学也是跨世纪前后的一种文学“胜景”。刘起林对此“胜景”的成因给出了解释:中国作家存在“盛世情结”。这是一个当代历史文学领域涉及面广泛却未获深入讨论的问题。作者赋予其两重含义:“首先是指热衷于以历史学判断的‘盛世’为创作题材进行‘盛世叙事’;更为深层的则是指创作主体普遍呈现出一种‘盛世’、‘乱世’、‘末世’的审美思维视野和认同以治国、执政文化开创‘盛世’的

价值取向。”^{[1]271}当这种“盛世情结”与中国改革开放造成的“盛世”光环相遇时,中国作家就从创作题材到审美路线,再到心理倾向和价值立场,都聚焦于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盛世文学”了。作者进而将直接描述王朝盛世的“盛世叙事”文本,区分为“以盛世主宰者为叙事核心”和“以历史上某位著名的改革、变法人物为主人公”两种叙事形态进行论述,这无疑又是对历史文学中“盛世历史叙事”一脉最富历史感的总结。

再次,《胜景与歧途》在个案研究中实现了对许多高难度学术问题的突破,推进了某些观念和思路均沿袭已久的问题的研究。

《胜景与歧途》首先从作家群体的角度选择“知青作家”,从文化底蕴的角度选择“历史文学”,从创作实绩的角度选择“农村题材创作”,从图书市场和审美接受效应的角度选择“官场小说”,分别进行了综合研究与文本细读相结合的探讨;然后又立足时代文学与文化发展的全局,从“现实题材创作的意蕴建构”和“历史题材叙事的审美意识”两个方面,对跨世纪文学的重大问题进行了提炼,并且既分析问题成因,又探索发展规律与解决之途。全书具体探讨的深入和整体审视的力度,由此可见一斑。

长期以来,“虚实之辨”是历史文学诗学问题的争论焦点。对此,刘起林在系统的梳理和考察之后认为:“单纯的‘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批评思路,虽然在对具体作品进行文本细读时有其必要性与合理性,但对于真正深入地探讨作品内在的精神文化和文学价值,对于深层次衡量新时期以来的各种类型的历史文学作品的影响与得失,其实并不具有普遍的适应性。”^{[1]312-313}在他看来,从鲁迅的《故事新编》到新中国诸多影响广泛的历史剧,“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都难以作为评判其价值内涵的核心标准,而且也没有作为其不可违逆的基本规范。由此看来,超越“虚实之辨”就势所必然。那

么,历史文学的价值内核到底是什么呢?刘起林认为:“以对于中华民族文化底蕴及其人格化形态的再现型开掘为审美境界与文化追求的核心,也许是转型期历史文学明智而大有可为的选择。历史文学创作只要艺术地抓住了这个核心,在其它方面均无妨各行其是,各显神通。……不管具体是哪个方向,只要达到极致,就都能形成一个相对的文学高峰。”^{[1]323-324}他进一步指出,历史文学的研究与评价也应把握住这个核心,然后“着力感受历史文学作品是否具有真切、浓厚的历史氛围,着力考察它对历史文化精神的展示是否丰富和深刻,对世情人性、生存本能的揭示是否独特和深邃”等方面。在我看来,这应该能为持续多年的历史文学诗学讨论,划上一个暂时的句号了吧?

最后,《胜景与歧途》的创新还体现在研究方法上。作者以民族精神文化发展是一个多元、渐进的历史过程为价值基础,以跨世纪文学和文化的“转型”与“演变”为理论的聚焦点,将全局性剖析和个案研究、文本细读结合起来,既呈现了各类文学创作在“多元”探索过程中成就与突破的艺术“胜景”,又深入揭示出其中因处于发展过程必然存在的局限和对时代文化全局缺乏深刻把握而导致的精神“歧途”。具体的论述则坚持论从史出、以论驭史的原则,努力将理论形态与历史形态、审美解读与社会文化认知、精神辨析与价值基础探寻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文本分析和超文本考察整合研究的学术范式,从方法论层面有力地助推了对于跨世纪文学律动与可能的深度把脉。

参考文献:

- [1] 刘起林. 胜景与歧途:跨世纪文学的多维审视[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责任编辑:黄声波